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苏南农户福利的变化[[1]](#footnote-1)\*

——基于无锡市惠山区新惠社区跟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赵学军 赵素芳

内容提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合村并居”现象日益普遍，社会舆论广泛关注，褒贬不一。农户家庭福利的损益，是客观评价“合村并居”合理性的重要标尺。而测度“合村并居”过程中农户福利水平的变化，需要连续多年的调查数据。地处苏南地区的无锡市，从21世纪之初即已开展“合村并居”集中居住，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家庭收入，提升了社会保障水平，改善了居住环境，农户整体福利水平有明显的上升。但农户家庭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在进一步提高家庭福利水平时，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居住条件、增加就业机会、提升社会保障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在趋于下降，而增加社会交往、提升社会机会所起的作用在逐渐增强。需要指出的是，无锡的“合村并居”型城镇化是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建立在充分的非农产业发展基础之上，城乡一体化已有实质性推进，土地流转与土地集约化经营成为急切需求，突破土地资源对经济发展严重制约瓶颈已水到渠成。其模式在经济发达地区推进循序渐进城镇化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但如果不具备条件，硬性推行“合村并居”，只能揠苗助长，适得其反。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农户 福利 苏南

中图分类号：F129 JEL：D60

**Farmers' Welfare Changes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during New Urbanization**

**——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racking Survey Data of Xinhui Community in Huishan District, Wuxi City**

ZHAO Xuejun1 ZHAO Sufang2

（1.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ng，China；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ng，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village merging”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The profit and loss of peasant households' welfare is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society.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measure the changes of farmers' welfare. Based on the tracking survey data of households in Xinhui Community, Huishan District, Wuxi City from 2014 to 2019. This paper used the questionnaire data and the fuzzy approach to estimate the changing trend of households in Wuxi.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welfare level of rural households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hey live together.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of peasant households have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ir welfare. However, after meeting the basic needs, the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living conditions,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living environment factors have less improvement on the welfare, while the effect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opportunity on improving family welfare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Therefore, the model of“village merging”based on certa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is feasible.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llage merg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and the follow-up policy should be formulated to ensure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residents' welfare level.

**Key words:**New Urbanization; Farmers; Welfare; South of Jiangsu Province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城镇化是中国社会、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2]](#footnote-2)。党的十九大报告仍然强调“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3]](#footnote-3)。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改变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的城镇化模式，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而不仅仅是城镇建设（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2013）。

新型城镇化尽管强调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镇建设，但城镇建设是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在城镇化过程中，少数村庄的衰败、消失不可避免。20世纪90年代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为解决当地工业化高速发展后出现的村庄空心化问题，加强城镇建设，政府推行“合村并居”。进入21世纪后，“合村并居”在我国东部地区更加普遍，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2020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许多地区经济发展下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2020年5月6日，山东省试图加快城镇化建设，省自然资源厅召开《山东省村庄布局专项规划》论证会，推进“合村并居”，却招致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有支持者，更有反对者，但反对声音居多（崔红志，2020）。批评者指出，“合村并居”是大面积侵犯农民基本利益的乱作为。“合村并居”引起的巨大争议，迫使山东省只得宣布“先一律暂停”。[[4]](#footnote-4)

是否应该全盘否定和彻底叫停“合村并居”，在学术界、政府部门产生不少分歧。没有支持产业、不以人为核心的“合村并居”城镇化，将损害农户的基本利益，必然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更要遭到农户的反对。什么是农民的基本利益？笔者以为，不妨换个视角，将农民基本利益视作“家庭福利”，从农户在城镇化中的福利损益来衡量是否可以推行“合村并居”。如果农户在“合村并居”的城镇化过程中获得的福利高于未城镇化时的福利，农户就不至于强烈反对“合村并居”。条件成熟的“合村并居”城镇化，则会被农户接受，这已被浙江、江苏发达地区城镇化的实践所证明。

福利最初主要是指“美好的生活”，被视为物质上的富裕程度。20世纪20年代末，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认为，经济福利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即社会福利中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那一部分福利，并提出了国民所得与经济福利对等的思想（庇古，2017）。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早期，学界关于福利的内涵已从单纯的物质财富的增加演变为多维度生活质量的提高。阿马蒂亚·森进一步拓展了福利问题研究的理论。他提出“可行能力理论”，主张以一个人具有的可行能力去判断他的生活质量与福利。他认为判断人们福利水平，不应根据其拥有的资源或商品多少进行，而需要通过评价其功能性活动的情况和由此产生的自由程度来加以衡量。他提出了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五种基本可行能力，目的是拓展人们的可行能力范围（森，2002）。森的可行能力方法为福利分析提供了更为完整的理论框架。高进云等（2010）在“可行能力”理论基础上，将农户福利的指标概括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区生活、环境和心理共6项功能性活动。笔者赞同这一农户家庭福利概念，结合自身调研情况，尝试从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交往、生活环境、社会机会6个方面，测度农户家庭福利的变化。

21世纪以来，中国持续推进的城镇化，给居民带来很大的福祉。段巍等（2020）基于空间均衡模型分析2000-2017年中国式城镇化的福利效应后，证明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福利有大幅度的增长。城镇化给农户福祉带来更多的变化，特别是农户集中居住后，家庭福利得到提升。徐烽烽等（2010）基于2009年12月与2010年3月对苏南2市4镇参加“土地换保障”农户的调查的438份有效问卷数据，用Sen的可行能力框架，衡量了苏南农户“土地换保障”前后福利的变化，认为农户总体福利水平明显提高，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社会机会、农民心理等功能指标均有较大程度的好转。伽红凯、王树进(2014)利用2013年5-7月对江苏省已实现农户集中居住模式的3个乡8个社区468份调查问卷数据，通过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居住环境、社会保障、社区活动、社会机会等6个方面23个指标，估测了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扬州市邗江区和宿迁市泗洪县468户农户在集中居住前后福利水平的变动情况，发现农户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水平较之前有所提升。易小燕等（2016）基于2015年12月对苏南惠山区、苏中如皋经济开发区和苏北新沂县已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的156份农户问卷数据，分析了苏南、苏中和苏北集中居住后农户福利的变化，发现苏南、苏中农户福利略有下降，苏北农户福利略有提高。杨丽霞等（2018）采用2017年4-6月浙江省义乌市3个街道18个行政村186份调查问卷结果，测度了浙江省义乌市宅基地退出前后农户福利水平的变化，认为农户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后，农户的总体福利水平提升。不过，相对于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中部一些地区农户“合村并居”后的福利似乎没有明显改进，甚至下降。张梦琳（2017）使用了2015年河南省新乡、焦作、新郑、信阳4市宅基地流转项目区腾地农户410份问卷资料，对河南省4市宅基地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情况作了实证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下降，且农户间福利差距加大。崔红志（2020）认为，各地的“合村并居”取得了一些预期的成效，农民福祉的总体水平明显增进，但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农民福祉改善不均衡，部分家庭的福祉状况堪忧。这说明在城镇化中推进集中居住，应该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产业发展条件，否则会弄巧成拙。

前述关于城镇化进程中“合村并居”集中居住后农户福利变化的论文，其家庭福利理论基础大部分都是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估测家庭福利的方法多数采用的是模糊评价法。在计算家庭福利时，大部分学者采用了Cheli & Lemmi（1995）所提出的权重计算方法，该方法注重隶属度较低的指标对于福利水平的改进作用，却忽略了总体福利水平随着各项指标的变化而单调变化。此外，在对于江苏、浙江、河南省农户“合村并居”集中居住后家庭福利变化的分析中，所使用资料都是一次问卷调查数据，缺乏对居民集中之后福利变化的动态追踪。

前述论文对于农户集中居住后家庭福利变动状况的判断存在分歧。认为江苏、浙江“合村并居”集中居住后，农户家庭福利总体上是提升的。而认为河南省等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农户“合村并居”集中居住后，福利水平是下降的。前述山东省“合村并居”集中居住规划会议引发的社会舆论风波，也从侧面证明了一些学者认为“合村并居”集中居住后农户的福利是下降的。如何看待学界的分歧？笔者以为，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江苏、浙江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模式，应该是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模式。不过，前述论文分析“合村并居”集中居住后农户的福利变化趋势存在不足，依靠某一时点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仅能证明这一时点前后农户家庭福利的变化，而不能说明此后的福利持续变动态势。要证明“合村并居”集中居住后农户的福利持续提升，需要基于连续几年的跟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源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课题的历史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一直对无锡农村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跟踪研究。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立了无锡市惠山区国情调研基地，已对该区新惠社区“农户转居民户”家庭经济状况跟踪调研6年，为分析集中居住后农户的福利变化提供了样本。本文在新惠社区“农户转居民户”家庭经济调查数据基础上，试图管窥发达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家庭福利的变动态势。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构建农户家庭福利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第三部分分析农户家庭福利变动态势，第四部分分析影响农户家庭福利持续改进的主要因素，第五部分为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农户家庭福利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

（一）农户家庭福利水平指标体系

由于单一客观或主观指数指标存在偏颇性，难以真实反映居民福利水平，本文试图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基础上，建立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复合指标体系，以考察无锡市惠山区集中居住后农户福利的变化。基于森所提出的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五种工具性自由及已有关于农户家庭福利的研究，根据本调查具体情况，笔者选取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交往、生活环境、社会机会6项反映农户福利的功能性活动，选择工资性收入、非工资性收入、收入感受等20项具体指标构建农户家庭福利水平指标体系。在本文所选取的各项具体评价指标中，仅恩格尔系数和空气质量为负向指标，其他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各项指标名称及其定义如表1所示。

1.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是反映农户家庭福利状况的重要因素。虽然森主张扩展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但他同时也承认国民生产总值或个人收入的增长对于扩展社会成员自由的重要性，并将经济条件作为他所认为的五种重要工具性自由之一（森，2002）。众多已有研究成果均表明，经济状况是影响个人和家庭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无锡市惠山区新惠苑小区农户“合村并居”后，几乎不再从事农业活动，其家庭收入结构、消费结构均发生了相应变化。因此，本文选择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非工资性收入、居民对收入感受、恩格尔系数和食物消费结构五个具体评价指标来衡量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

2.居住条件。住房从物理上为家庭成员提供容身之处，从心理上为其提供安全感与自我提升的空间，其包含的众多特点是家庭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Bratt，2002）。加之我国重视家庭的传统，农户家庭的福利状况对居住条件有更强的依赖性。“合村并居”后，居民从自建房搬入小区的单元房，居住条件、能源使用较拆迁前有很大不同，对其福利水平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本文选择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从数量上表示住房空间舒适度，采用家庭人均用电量和燃气使用量从能源供应上衡量住房条件，以此来反映农户居住条件的变化。

3.就业与社会保障。农户的就业与社会保障状况对于其福利具有重要影响。森着重强调了防护性保障的作用，指出防护性保障相当于安全网，保证人们不至于因为受物质条件的变化而落入贫苦境地（森，2002）。本文调查的农户在拆迁之前拥有土地所带来的天然保障，集中居住之后，该保障消失，就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但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增加。因此，选择家庭就业人数和居民对就业机会的感受代表农户就业状况，选择转移性收入、居民对于社会保障的感受代表社会保障状况。

4.社会交往。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footnote-5)”。个人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很好的满足自己的需求，从而获得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个人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6]](#footnote-6)。同时，社会交往也是满足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人们实现情感和归属需要”的重要保障。由此可见社会交往的重要性。与拆迁前相比，农户在集中居住之后的生活与工作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对社会交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选取劳动力从事就业地点和人情支出作为代表农户社会交往的指标。

5.生活环境。居民的生活环境对其福利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黄永明、何凌云，2013；郑君君等，2015）。拆迁前，该小区居民主要居住在惠山区的农村，分布相对分散，人口密度较小，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集中居住后居民集中居住在小区的楼房中，道路基础设施有所改善，生活环境较之前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选择交通基础设施、空气质量和社会治安状况三项指标代表农户生活环境状况。

6.社会机会。社会机会是指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它影响人们享受更好生活的自由（森，2002）。“合村并居”后，居民所面临的教育机会、文化氛围和医疗保健条件将有所改善，对其福利产生较大影响。本文选择户主教育状况、文化氛围和健康状况作为反映社会机会的指标。

表1指标体系及其定义

|  |  |  |  |  |  |
| --- | --- | --- | --- | --- | --- |
| 功能性活动 | 具体评价指标 | 定义与赋值 | 类型 | 对福利作用方向 | 适用隶属度公式 |
| 1家庭经济  状况 | 人均工资收入 | 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 | C | + | （1） |
| 人均非工资收入 | 家庭人均非工资性收入 | C | + | （1） |
| 收入感受 | 居民对收入感受。变少=-1；没有变化=0；变多=1 | Q | + | （3） |
| 恩格尔系数 | 家庭年食品支出总额/支出总额 | C | - | （2） |
| 食物消费结构 | 肉、蛋、奶、水产品、瓜果及其制品消费量/食物总消费量 | C | + | （1） |
| 2居住条件 | 人均住房面积 | 家庭人均拥有住房面积 | C | + | （1） |
| 人均用电量 | 家庭人均年用电量 | C | + | （1） |
| 人均天然气使用量 | 家庭人均年天然气使用量 | C | + | （1） |
| 3就业与  社会保障 | 就业人数 | 家庭就业人数 | C | + | （1） |
| 转移性收入 | 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 | C | + | （1） |
| 就业感受 | 居民对就业机会的感受。变少=-1；没有变化=0；变多=1 | Q | + | （3） |
| 社会保障感受 | 居民对社会保障的感受。变坏=-1；没有变化=0；变好=1 | Q | + | （3） |
| 4社会交往 | 劳动力就业地点 | 家庭第一劳动力从事就业地点。外省=0；本市以外，本省以内=1；本县（区）以外，本市以内=2；本县（区）以内，本乡（街道）以外=3；本村（社区）以外，本乡（街道）以内=4；本村（社区）=5 | Q | + | （3） |
| 人情支出 | 家庭人情支出 | C | + | （1） |
| 5生活环境 | 交通基础设施 | 无锡市道路面积/建成区面积 | C | + | （1） |
| 空气质量 | 无锡市PM10 | C | - | （2） |
| 社会治安 | 居民对社会治安的感受。变坏=-1；没有变化=0；变好=1 | Q | + | （3） |
| 6社会机会 | 教育状况 | 户主受教育水平。未上学=0；小学=1；初中=2；高中=3；大专以上=4 | Q | + | （3） |
| 文化氛围 | 居民对文化氛围的感受。变坏=-1；没有变化=0；变好=1 | Q | + | （3） |
| 健康状况 | 户主健康状况。患病无劳动能力=0；患病有劳动能力=1；健康=2 | Q | + | （3） |

（二）估算方法

福利计量具有复杂性和模糊性特点，本文采用模糊评价法来计算集中居住农户家庭福利水平变动态势。首先根据模糊评价法确定居民家庭福利隶属函数，然后根据设定的各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计算各评价指标的隶属度，并按照一定方法计算其权重，最后合成福利隶属度。具体步骤如下：

1.居民家庭福利隶属函数的确定。根据模糊评价方法，用模糊集来表示农户家庭的福利状况，反映农户福利状况的各项功能性内容称为的子集，因此第个农户家庭的福利函数为。其中，为对的隶属度，其中。当隶属度越接近1，表示福利水平越高；越接近0，表示福利水平越差。一般情况下，指标类型可分为三类：连续型变量、虚拟二分变量以及虚拟定性变量（Miceli，1998）。对于不同的指标，隶属函数的计算方法则不相同，此处仅介绍连续型变量和虚拟定性变量的隶属函数确定方法。

设是表示农户福利状况的第个功能子集，则表示测度第个功能的第项评价指标。据此可以写出农户福利的初级指标为，其中,表示评价农户福利的功能性活动的个数；,表示第个功能性活动中评价指标的数量。

（1）连续型变量。对于连续型变量通常采用连续型隶属函数，常用的隶属函数有梯形分布、岭形分布、抛物型分布及正态分布等。借鉴高进云、乔荣峰（2010）的研究方法，对于本文涉及的连续型变量分别采用升半梯形分布、降半梯形分布的隶属函数。

升半梯形分布的隶属函数为:

（1）

降半梯形分布的隶属函数为:

（2）

上式中，则表示第个功能子集第个指标值，表示指标值的上限，表示指标值的下限。（1）式表示的值越大，农户福利水平越高，（2）式表示的值越大，农户福利水平越差。

（2）虚拟定性变量。对于现实生活中很多无法用准确数据进行测量的现象，一般采用语言进行定性描述，这种定性描述一般按照强弱程度进行分组。例如，在考察受访者对某一问题的接受程度时，设置了“十分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十分不同意”这五种状态，要求受访者在这五种状态之中选择最为认同的一种，这一变量称为虚拟定性变量。假设研究问题有种状态，对这种状态分别进行依次等距赋值，即对，通常设,且，（Miceli，1998）。若该指标为正指标，则变量值越大表示福利状况越好。

虚拟定性变量的隶属函数为:

（3）

其中，表示指标值的上限，表示指标值的下限。各项评价指标所对应的隶属函数见表1。

2.权重确定。农户福利水平的计算，需要在得到评价指标隶属度的基础上进行汇总。而汇总时需要对各项指标的权重进行确定。本文采用高进云、乔荣峰（2010）提出的权重计算方法，指标的权重的计算公式为：，其中，。在该种权重计算方法之下，可以保证两点：一是随着指标值的增加，该指标对应的权重边际递减。即在发生同等幅度的变化时，隶属度较小的指标相对于隶属度较大的指标对于福利产生的提升作用更大；二是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某些单项指标的变动会带来总福利的同向变动。

3.隶属度汇总。在以上福利隶属函数和权重确定的基础上，根据Cerioli & Zani（1990）提出的公式进行指标汇总，得出农户家庭各功能的隶属度，其中，表示第个功能子集中包含的初级指标个数。再根据公式计算出居民家庭总体隶属度，其中，，表示对于农户家庭进行福利评价时所包含的功能子集个数。

（三）连续型指标最大值最小值的确定

确定初级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对于居民家庭福利的计算结果至关重要，在最大值、最小值的设定过程中，应遵循客观性的原则。本文参考已有文献，根据调研数据的实际情况，结合无锡市历年来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对各初级指标的最大最小值进行设定，由于该小区的搬迁主要集中于2002-2005年间，拆迁前一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确定及计算本文统一确定参考中间年份2003年相关数据。具体数值及确定过程见表2。

表2指标最大值最小值设定

|  |  |
| --- | --- |
| 指标名称 | 最大值最小值设定 |
| 人均工资收入 | 采用0作为最小值，采用2019年无锡市最高人均工资性收入41359元作为最大值，除2019年以外，其他年份均按照无锡市的CPI进行调整，2018年为40193元，2017年为39290元，2016年为38557元，2015年为37690元，2014年为37024元，拆迁前一年为27180元。 |
| 人均非工资收入 | 采用0作为最小值，采用2019年无锡市最高人均非工资性收入20556元作为最大值，除2019年以外，其他年份均按照无锡市的CPI进行调整值，2018年为19977元，2017年为19528元，2016年为19163元，2015年为18733元，2014年为18401元，拆迁前一年为13509元。 |
| 恩格尔系数 |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根据恩格尔系数标准，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59%为贫穷；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因此，本文设定恩格尔系数的最大值为59%，最小值为30%。 |
| 食物消费结构 |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版》中所推荐各种食物每日摄入量，选取通过各种食物推荐摄入量的中值所计算的肉、蛋、奶、水产品、瓜果摄入量与所有食物总摄入量之比0.49作为最大值，最小值选择0。 |
| 人均住房面积 | 由于集中居住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因此2014-2019年最大值选择2019年无锡城镇常住居民人均住房面积47.07平方米；拆迁前一年住房多为农村自建房，所以其最大值选择2019年无锡市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58.56平方米；最小值选择人均最低住房标准18平方米。 |
| 人均用电量 | 选取2018年无锡市城镇常住居民的人均年用电量613.49度为最大值，0为最小值。 |
| 人均天然气使用量 | 选取2018年无锡市的城市人均天然气使用量98为最大值，0为最小值。 |
| 就业人数 | 选取无锡市2003年的农村家庭总人口就业比0.67作为最大值，0为最小值。 |
| 人均转移性收入 | 选取无锡市2019年人均转移性收入8606元作为最大值，其他年份按照CPI进行调整，2018年为8363元，2017年为8175元，2016年为8023元，2015年为7843元，2014年为7704元，拆迁前一年为5656元，0作为最小值。 |
| 人情来往支出 | 因各地区的风俗习惯不同，所以该指标的最大值从调研数据本身进行选取。选取2014年的家庭人情往来支出8634元作为各年最大值，其他年份按照CPI进行调整，2019年为9645元，2018年为9373元，2017年为9162元，2016年为8992元，2015年为8789元，拆迁前一年为6338元，0为最小值。 |
| 交通基础设施 |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00-95)，对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大城市，城市道路用地面积应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宜为15%～20%值，此处选择15%作为最小值，选择2003年无锡市的城市道路用地面积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之比24.22%作为最大值。 |
| 空气质量 | 根据我国2016年1月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选择日平均PM10一级标准值50作为最小值，二级标准值150最为最大值。 |

（四）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的数据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4-2019年无锡市惠山区新惠社区“农户转居民户”家庭经济情况典型调查问卷数据。

无锡市惠山区新惠社区“农户转居民户”家庭经济情况典型调查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及其前身持续开展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课题的延续。1929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始首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行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1988年、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相继实施了第三次、第四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进入21世纪后，城镇化加速发展，为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户经济的转型问题，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又组织了小规模的“无锡、保定农户收支调查”。2014年，为持续跟踪无锡市农户“合村并居”集中居住后家庭经济的变化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惠山区建立了国情调研基地。

苏南地区无锡市的城镇化进程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农村经济飞速发展。1997年底无锡市开始启动农户向小城镇集中的城镇化措施。进入21世纪后，无锡市又积极推进“村改居”，“合村并居”集中居住，以宅基地置换城镇安置房，实现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化（赵学军、隋福民，2017）。无锡市是最早探索农户“合村并居”集中居住的地区，总体上看，“合村并居”集中居住的城镇化措施比较成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选取无锡市惠山区新惠苑调研观察点，开展“农户转居民户”家庭经济情况典型调查。新惠苑建立于2002年，是惠山区政府为安置拆迁农户而建造的区内第一个现代化的农户安置小区。2005年10月，无锡市大力实施行政村“撤村建居”，惠山区政府在新惠苑基础上组建了新惠社区，安置原来堰桥镇六个行政村的拆迁农户。2009年9月，新惠苑和复地公园小区合并为新的新惠社区。社区占地面积近73万平方米，住户5765户，在册户籍人口9248人，流动人口3112人。

本项调查在新惠社区新惠苑选取200户“合村并居”集中居住的住户，进行跟踪调查。被调查户抽样工作基于四个原则：第一，被调查住户为原来堰桥镇的农户，拆迁后安置到本社区；第二，被调查住户应覆盖新惠苑各栋住宅楼；第三，由于新惠苑住户从拆迁安置到2014年已经过去十余年时间，涉及到10余年前的经济情况调查研究，被调查户户主应在35岁以上，因此，在抽样时，根据该小区的户主年龄分布进行户主选择，户主在35～45岁的家庭抽样约三分之一，户主在46～55岁的家庭抽样约三分之一，户主在56岁以上的家庭抽样约三分之一；第四，父子同在本小区居住的家庭，只抽取其中之一。具体抽样户由新惠小区工作人员负责。因为在后续的跟踪调查中，有的住户搬走或常年不在本小区居住，有的家庭子女成家而分门立户，有的老人失去独自生活能力，有的户主年龄偏高，需要调整被调查户，为保证跟踪调查的住户基本稳定，被调查户每年更换十分之一。调查的内容有：家庭基本情况、家庭居住条件的变化、转为居民户后的感受、家庭支出的变化、家庭收入的变化、家庭承包土地的变化、家庭就业情况、家庭能源及水资源使用量的变化、家庭主要食物消费量的变化、家庭借贷。

从2014年到2019年，课题组已连续对新惠苑“合村并居”集中居住住户跟踪调查了6年，积累了其从拆迁前一年至2019年间7年的家庭经济状况资料。农户拆迁前一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8年有效问卷均为200份，2017年为194份，2019年为191份。

三、集中居住后农户家庭福利水平变动态势

本文基于2014-2019年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农户转居民户”家庭经济调查数据，以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建立指标体系，运用模糊评价法测算各项指标的隶属度，采用高进云、乔荣峰（2010）所提出的权重计算法对各指标赋予权重，以估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居民家庭的福利水平的变化。估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家庭福利水平的模糊评价结果——隶属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隶属度  指标名称 | 拆迁前 | 2014年 | 2015年 | 2016年 | 2017年 | 2018年 | 2019年 |
| 1家庭经济状况 | 0.3273 | 0.5701 | 0.5225 | 0.5652 | 0.6067 | 0.6048 | 0.6048 |
| 人均工资收入 | 0.2191 | 0.3393 | 0.4928 | 0.5214 | 0.4834 | 0.5111 | 0.4467 |
| 人均非工资收入 | 0.1219 | 0.5124 | 0.1756 | 0.2023 | 0.2945 | 0.2706 | 0.4608 |
| 收入感受 | 0.5000 | 0.8225 | 0.8900 | 0.9250 | 0.8918 | 0.9975 | 0.9110 |
| 恩格尔系数 | 0.7826 | 0.7699 | 0.7215 | 0.7481 | 0.7410 | 0.6939 | 0.6038 |
| 食物消费结构 | 0.3641 | 0.5484 | 0.7330 | 0.8210 | 0.8842 | 0.8580 | 0.7140 |
| 2居住条件 | 0.4313 | 0.7927 | 0.7993 | 0.8110 | 0.7416 | 0.8079 | 0.7368 |
| 人均住房面积 | 0.8752 | 0.8815 | 0.8567 | 0.8400 | 0.8093 | 0.8320 | 0.8468 |
| 人均用电量 | 0.4038 | 0.7599 | 0.7232 | 0.7325 | 0.6618 | 0.6944 | 0.5880 |
| 人均天然气使用量 | 0.2262 | 0.7437 | 0.8243 | 0.8671 | 0.7616 | 0.9128 | 0.8036 |
| 3就业与社会保障 | 0.1719 | 0.5202 | 0.5513 | 0.5620 | 0.6358 | 0.6171 | 0.6475 |
| 就业人数 | 0.7841 | 0.6128 | 0.5747 | 0.4820 | 0.4452 | 0.5379 | 0.4853 |
| 转移性收入 | 0.0100 | 0.1620 | 0.1949 | 0.2282 | 0.3922 | 0.2793 | 0.4057 |
| 就业感受 | 0.5000 | 0.8000 | 0.8950 | 0.9450 | 0.9562 | 0.9800 | 0.8979 |
| 社会保障感受 | 0.5000 | 0.9725 | 0.9550 | 0.9775 | 0.9794 | 0.9975 | 0.9948 |
| 4社会交往 | 0.5259 | 0.5208 | 0.5098 | 0.4540 | 0.3981 | 0.5061 | 0.3427 |
| 人情来往支出 | 0.4014 | 0.5697 | 0.5496 | 0.5663 | 0.4331 | 0.5532 | 0.3493 |
| 劳动力就业地点 | 0.6890 | 0.4760 | 0.4730 | 0.3640 | 0.3660 | 0.4630 | 0.3361 |
| 5生活环境 | 0.5318 | 0.7017 | 0.7826 | 0.8462 | 0.8661 | 0.9049 | 0.9305 |
| 交通基础设施 | 1.0000 | 0.7310 | 0.8633 | 0.9002 | 0.9599 | 0.9881 | 1.0000 |
| 空气质量 | 0.3000 | 0.4900 | 0.5700 | 0.6800 | 0.7100 | 0.7500 | 0.8100 |
| 社会治安 | 0.5000 | 0.9650 | 0.9750 | 0.9900 | 0.9536 | 1.0000 | 0.9948 |
| 6社会机会 | 0.6242 | 0.7817 | 0.7916 | 0.7697 | 0.7730 | 0.7860 | 0.7963 |
| 教育状况 | 0.5338 | 0.5338 | 0.5325 | 0.4825 | 0.4845 | 0.5288 | 0.5628 |
| 文化氛围 | 0.5000 | 0.9850 | 0.9800 | 0.9825 | 0.9923 | 0.9975 | 0.9005 |
| 健康状况 | 0.9100 | 0.9100 | 0.9525 | 0.9650 | 0.9639 | 0.9225 | 0.9974 |
| 总隶属度 | 0.4009 | 0.6375 | 0.6461 | 0.6510 | 0.6508 | 0.6906 | 0.6460 |

（一）各功能性活动指标变化趋势分析

1.集中居住后农户家庭经济状况隶属度有显著提升。2000年被拆迁农户开始入住安置小区，绝大多数居民是在2002年到2006年期间入住小区。课题组在2014年对小区居民开展问卷调查，这一年农户家庭经济状况隶属度较集中居住前有十分显著的提升，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后续年份。从计量情况看，农户家庭经济状况隶属度从拆迁前的0.3273增长至2014年的0.5701，随后一年下降至0.5225，后续的几年中基本保持平缓的上升趋势，且上升速度逐渐下降。这是因为2014年家庭获得的非工资性收入提高、居民关于收入的主观感受上升、食物消费结构的改善带来了福利的大幅度提升。集中居住后的2014--2019年间，居民经济状况隶属度均超过了0.5，显著高于拆迁前的0.3273，达到了“好”的福利标准。从家庭收入来看，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指标的隶属度在拆迁前一年较低，主要是因为拆迁前该小区居民非农就业机会少于拆迁后的年份，集中居住后除了2017年和2019年之外，其他各年工资性收入均为稳步上升；非工资性收入的隶属度除了2014年和2015年快速上涨与下降之外，其他年份基本呈现稳步上升态势，这主要与拆迁后养老金、土地补偿等转移收入增加有关。从恩格尔系数的隶属度来看，拆迁后虽然食物支出绝对量大幅增加，但是居民的收入绝对量也在增加，因此恩格尔系数上升并不多，且其带来的福利效应下降较为有限，2014年的隶属度为0.7699，仅稍微低于拆迁前一年的0.7826。但是在随后的年份中，恩格尔系数的隶属度基本保持稳中下降趋势。从食物消费结构来看，农户家庭食物消费结构的隶属度从拆迁前的0.3641上升至2014年的0.5484，并在后续的几年中保持上升至2017年的0.8842，随后下降至2019年的0.7140。这可能与那几年猪肉价格上涨、人们对未来预期收入变化有关。从居民主观方面看，除2017年和2019年，其他年份人们关于收入感受的隶属度呈现上升趋势。

2.居住条件带来的农户家庭福利变化有明显提升。整体上看，集中居住后农户家庭居住条件指标的隶属度较拆迁前提升的幅度较为明显。拆迁前一年农户家庭居住条件的隶属度为0.4313，2014年上升至0.7927，此后几年中基本上保持了小幅震荡态势。其中，人均拥有住房面积的隶属度在拆迁前后变化并不大，这说明该地区的拆迁补偿政策较为合理。从住房能源消费方面看，拆迁后的人均电力使用量和天然气使用量均较之前有所提升，人均电力使用量隶属度从拆迁前的0.4038上升至2014年的0.7599，随后下降至2019年的0.5880。这一方面与家用电器的节能效果提升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人们积极响应节约能源的号召有关。天然气使用量的隶属度提升大幅度较大，从拆迁前的0.2262提升至2014年的0.7437，在后续年份中几乎保持震荡上升趋势，2019年该指标隶属度达到0.8036。

3.社会保障带来的农户家庭福利也在上升。农户家庭社会保障指标的隶属度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且集中居住后较拆迁前一年有较大幅度增长。2019年，社会保障指标的隶属度达到0.6475，比拆迁前的0.1719有明显提升。其中，家庭就业人数的隶属度有所下降，从拆迁前的0.7841下降至2019年的0.4853，下降幅度较为明显。相比拆迁之前，集中居住后家庭平均就业人数减少，可能是因为拆迁前农业劳动以家庭为单位，家中妇女老人均可参与，但集中居住之后，居民失去土地，家中就业人数有所下降。除2018年外，养老金及其他补贴等转移性收入的隶属度均在上升，但是相比其他指标，该指标的隶属度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19年才达到0.4057，尚未达到0.5的标准值。居民关于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隶属度整体呈现稳中上升趋势，且隶属度较高。

4.社会交往产生的农户家庭福利变化呈现出下降趋势。从整体看来，除2018年以外，其他年份农户家庭社会交往指标的隶属度均表现出下降趋势。2019年社会交往的隶属度仅为0.3427，低于拆迁前一年的0.5259。人情往来支出和劳动力从业地点的隶属度均处于小于0.5的较低水平。其中，人情往来支出的隶属度水平在拆迁后最初的几年中较拆迁前一年稍有上升，但整体基本平稳，仅个别年份有所上升与下降。劳动力从业地点的隶属度逐渐降低，这是因为异地就业的人数在增加。

5.生活环境带来的农户家庭福利变化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被调查小区所处地区的基础设施、空气质量与居民对社会治安感受的隶属度，均为明显的上升趋势。首先，无锡市地处太湖之滨，生态环境良好。其次，近些年无锡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加大了环境的治理力度，成效显著。从数据上来看，该地区的生活环境隶属度2019年最高达到0.9305，各项初级指标的隶属度也基本上在0.5以上，整体处于较高的水平。

6.社会机会方面带来的农户家庭福利变化表现为平稳上升趋势。总体来看，农户家庭社会机会指标的隶属度较高且稳定，在2019年达到0.7963，明显高于拆迁前一年的0.6242，整体呈现平稳上升趋势。其中，教育情况指标的隶属度较拆迁前有所提升，且变化较为平稳，文化氛围指标的隶属度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居民健康状况指标的隶属度较拆迁前一年有明显提升，但是幅度不大，整体处于一个较高水平。这反映出集中居住之后，居民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二）农户家庭总体福利水平分析

综合上述各项分析，农户家庭集中居住后，总福利水平有明显的提升，总福利隶属度由拆迁前一年的0.4009上升至2014年的0.6375，提升幅度较大。此后，除2019年福利水平稍有下降之外，其他年份的居民家庭的总福利水平整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截至2019年，居民整体福利隶属度达到0.6460。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交往、生活环境、社会机会均在2014年超过了0.5的中间值，达到了福利“好”的标准，大部分功能性活动指标的隶属度基本上呈现稳定上升趋势。见表3和图1。但是，社会交往水平的隶属度在后来有所下降，在2019年又跌破了0.5的中间值，处于0.3427的较低水平。2019年，六项功能性活动指标中，生活环境指标的隶属度最高，达到0.9305。社会机会的隶属度为0.7963，排第二位。居住条件的隶属度为0.7368，排第三位。之后依次是就业与社会保障、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交往。

从各项初级指标来看，2019年，家庭工资性收入、非工资性收入、家庭就业人数、人均转移性收入、人情往来支出、劳动力就业地点六项指标隶属度均未达到0.5的中间值，未来有较大提升空间。这反映出集中居住后，虽然该小区整体氛围、环境及居住条件较好，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也持续向好，但是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收入、就业与社会保障均有待提升与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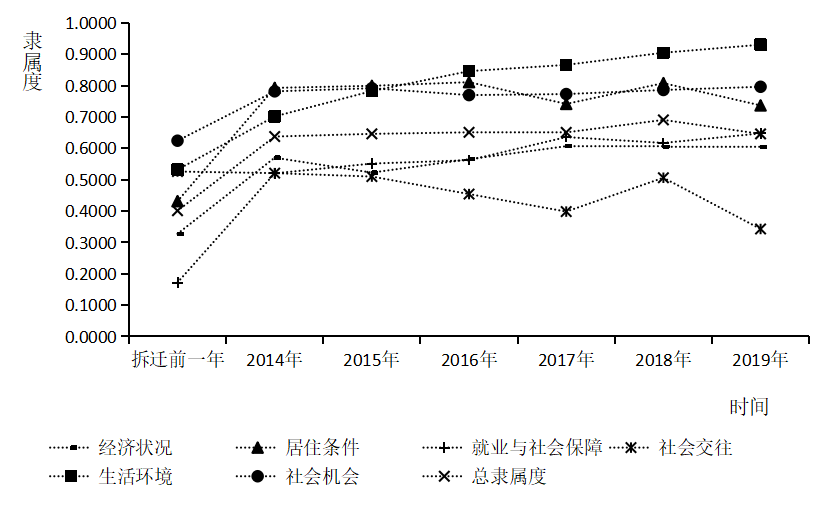


图1居民总福利水平与各指标隶属度

四、集中居住后农户家庭福利组成要素贡献率的变动态势

前文分析了拆迁前后农户家庭福利的持续变化情况，进一步要探讨的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户家庭福利的变动。在福利指标体系中，各分项指标的权重代表该指标对于福利整体的重要程度，能够反映各项指标的变动对家庭福利改善的作用。由于传统的固定权重不能有效反映处于不同水平的指标对于总体福利水平的贡献度差异，所以在计算居民家庭福利时经常采用可变权重。如Cheli & Lemmi（1995）更加注重隶属度较低的指标对于福利水平的改进作用，对于隶属度较低的指标赋予较大权重；高进云、乔荣峰（2010）在关注隶属度较低的指标的同时，注重总体福利水平随着各项指标的变化而单调变化。本文采用高进云、乔荣峰（2010）提出的可变权重计算方法，该计算方法蕴含三个基本假定：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些评价指标单调变化，福利指数也随之单调变化；二是功能性活动或二级指标彼此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即边际替代率无穷大；三是随着评价指标值的增加，该指标对应的权重边际递减。在这些假设条件下，农户家庭福利水平的提升不是只靠某一条件的改善，而是同时受到组成福利的所有指标和功能性活动的影响。各项指标值的提升对于家庭总体福利提升均有作用，由于隶属度值较小、获得程度较低的指标被赋予较大的权重值，因此该类指标状况的改善对整体福利的改进将起到较大的作用。同时，各级指标或功能性活动的权重值只与该指标或功能性活动的隶属度大小有关，不受其他指标或功能性活动的影响。为了便于考察在不同年份中各项指标对居民家庭福利水平相对贡献度的变化，本文对权重进行归一化处理。根据农户家庭福利隶属度，笔者计算出农户家庭福利各指标的权重，见表4。表4反映出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交往、生活环境等因素在农户家庭福利持续改善中的不同作用。

表4 家庭福利水平的模糊评价结果——权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指标名称 | 拆迁前 | 2014年 | 2015年 | 2016年 | 2017年 | 2018年 | 2019年 |
| 1家庭经济状况 | 0.1802 | 0.1755 | 0.1844 | 0.1777 | 0.1713 | 0.1772 | 0.1701 |
| 人均工资收入 | 0.2322 | 0.2560 | 0.1974 | 0.2005 | 0.2191 | 0.2118 | 0.2306 |
| 人均非工资收入 | 0.3112 | 0.2083 | 0.3307 | 0.3219 | 0.2807 | 0.2912 | 0.2271 |
| 收入感受 | 0.1537 | 0.1644 | 0.1469 | 0.1505 | 0.1613 | 0.1516 | 0.1615 |
| 恩格尔系数 | 0.1228 | 0.1699 | 0.1631 | 0.1674 | 0.1770 | 0.1818 | 0.1984 |
| 食物消费结构 | 0.1801 | 0.2014 | 0.1619 | 0.1598 | 0.1620 | 0.1635 | 0.1824 |
| 2居住条件 | 0.1570 | 0.1489 | 0.1491 | 0.1483 | 0.1549 | 0.1533 | 0.1541 |
| 人均住房面积 | 0.2253 | 0.3159 | 0.3218 | 0.3273 | 0.3188 | 0.3279 | 0.3099 |
| 人均用电量 | 0.3316 | 0.3402 | 0.3502 | 0.3505 | 0.3526 | 0.3590 | 0.3719 |
| 人均天然气使用量 | 0.4431 | 0.3439 | 0.3280 | 0.3222 | 0.3286 | 0.3131 | 0.3181 |
| 3就业与社会保障 | 0.2487 | 0.1838 | 0.1795 | 0.1782 | 0.1673 | 0.1754 | 0.1644 |
| 就业人数 | 0.0809 | 0.2167 | 0.2329 | 0.2584 | 0.2922 | 0.2589 | 0.2835 |
| 转移性收入 | 0.7165 | 0.4215 | 0.3999 | 0.3756 | 0.3114 | 0.3593 | 0.3101 |
| 就业感受 | 0.1013 | 0.1897 | 0.1866 | 0.1845 | 0.1994 | 0.1918 | 0.2084 |
| 社会保障感受 | 0.1013 | 0.1720 | 0.1807 | 0.1815 | 0.1970 | 0.1901 | 0.1980 |
| 4社会交往 | 0.1422 | 0.1837 | 0.1866 | 0.1983 | 0.2114 | 0.1937 | 0.2260 |
| 人情来往支出 | 0.5671 | 0.4775 | 0.4813 | 0.4450 | 0.4790 | 0.4778 | 0.4952 |
| 劳动力就业地点 | 0.4329 | 0.5225 | 0.5187 | 0.5550 | 0.5210 | 0.5222 | 0.5048 |
| 5生活环境 | 0.1414 | 0.1582 | 0.1506 | 0.1452 | 0.1433 | 0.1449 | 0.1371 |
| 交通基础设施 | 0.2359 | 0.3234 | 0.3153 | 0.3221 | 0.3159 | 0.3183 | 0.3212 |
| 空气质量 | 0.4306 | 0.3951 | 0.3880 | 0.3707 | 0.3673 | 0.3653 | 0.3568 |
| 社会治安 | 0.3335 | 0.2815 | 0.2967 | 0.3072 | 0.3169 | 0.3164 | 0.3220 |
| 6社会机会 | 0.1305 | 0.1499 | 0.1498 | 0.1523 | 0.1517 | 0.1554 | 0.1482 |
| 教育状况 | 0.3573 | 0.3997 | 0.4024 | 0.4153 | 0.4153 | 0.4024 | 0.3934 |
| 文化氛围 | 0.3691 | 0.2942 | 0.2967 | 0.2910 | 0.2902 | 0.2930 | 0.3110 |
| 健康状况 | 0.2736 | 0.3061 | 0.3009 | 0.2937 | 0.2945 | 0.3046 | 0.2955 |

（一）各功能性活动指标的贡献度变动态势

1.家庭经济状况改善对农户家庭福利持续提高的作用在下降。从表4可以看出，拆迁之前，农户家庭经济状况指标的权重值为0.1802，此后一直下降至2019年的0.1701。拆迁前农户家庭经济状况指标的权重高于集中居住之后的水平，说明农户拆迁之前的整体经济水平较低，经济水平的提升对于改善福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随着农户经济水平的持续提高，该指标的权重呈现出逐年递减的态势，表明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所带来的福利效应在逐渐递减。在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的二级指标中，人均工资收入与非工资收入的权重值一直高于居民关于收入感受、恩格尔系数和食物消费结构的权重值，表明增加家庭人均工资与非工资收入所带来的福利效应要高于居民关于收入感受、恩格尔系数与食物消费结构改变而带来的福利效应。拆迁之前，农户家庭非工资性收入对于居民家庭福利水平具有较高的贡献度，其权重值达到0.3112。农户集中居住后，工资性收入与非工资性收入对于福利提升的贡献度逐渐趋于接近。恩格尔系数的权重值呈现出逐渐增加态势，由拆迁前的0.1228增加至2019年的0.1984，对家庭经济状况功能性活动的贡献度仅次于家庭工资收入和非工资收入。农户对收入评价和食物消费结构的权重值一直以来较为稳定，变化不大。

2.居住条件改善对于农户家庭福利增长有重要的作用。拆迁之后，农户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这对于农户福利水平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农户家庭居住条件的权重来看，该指标的权重值基本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与拆迁前居住条件的权重值0.1570相比，2019年的0.1541变化不大。其中，人均拥有住房面积的权重值在集中居住后较之前有明显增加，人均电力使用量指标权重呈现上升态势，人均天然气使用量权重有明显下降。2019年，居住条件功能性活动的三项初级指标的贡献度较为均衡，均处于0.3～0.4之间。

3.就业与社会保障对于改进农户福利水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后续的促进作用有所下降。从就业与社会保障的权重值来看，拆迁之前，由于农户家庭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其权重为0.2487的水平，之后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对于农户福利水平的提升具有较大作用。然而，随着整体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该指标的福利效应逐渐下降至2019年的0.1644，说明社会保障的改善对于福利提升的贡献度正逐渐下降。从初级指标来看，拆迁后家庭就业人数的权重值比拆迁前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表明，改善农户的就业状况对提升其家庭福利水平仍然十分重要。人均转移性收入的权重值下降幅度最大，由拆迁前的0.7165下降至2019年的0.3101，但该指标的权重值仍然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说明养老金等人均转移性收入的提高对于提升居民家庭福利水平仍然十分重要。农户关于就业感受和社会保障感受的权重值也逐渐增大，说明未来提升就业与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十分必要性，且十分紧迫。

4.社会交往对于农户家庭福利持续提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除个别年份外，伴随着社会交往方面的福利水平逐年下降，该指标的权重值基本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从拆迁前的0.1422上升至2019年的0.2260。其中，人情往来支出的权重值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趋势，而劳动力从业地点的权重值由拆迁前的0.4329上升至2019年的0.5048，基本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社会交往状况的改善对于提升农户家庭福利水平日益重要。改善农户家庭的社会交往状况，尤其是改变劳动力就业地点，可以有效促进农户家庭福利水平的提升。

5.生活环境对于农户家庭福利的持续增长仍然十分重要。从生活环境的权重值来看，拆迁之前为0.1414，此后一直下降至0.1371。与经济状况隶属度逐年上升相对应，该项指标的隶属度也上升至较高的水平。高质量的环境对于提高居民家庭福利水平仍有重要的意义，未来应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活环境。

6.社会机会是提升农户家庭福利的重要抓手。除2019年稍有下降，社会机会的权重整体呈现出逐渐上升趋势，由拆迁前的0.1305上升至2018年的0.1554，随后稍有下降，2019年达到0.1482，仍然显著高于拆迁之前的水平。其中，文化氛围的权重值在集中居住之后有所下降，而教育状况、健康状况的权重值较拆迁前有明显上升。由此可见，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仍然是提升农户家庭福利的重要途径，且会十分有效。

（二）农户家庭福利组成要素贡献率变动态势综合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农户集中居住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居住条件的提升、社会保障完善与生活环境的改善，对于家庭福利水平的提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集中居住后的数年间中，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就业与社会保障、生活环境指标的权重值逐渐下降，而社会交往、社会机会的权重值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逐渐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当居民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就业与社会保障以及生活环境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们对进一步提升农户家庭福利水平的效果在下降，而社会交往、社会机会对提农户家庭福利水平的重要性却在上升。从各功能性指标的相对重要度来看，拆迁前一年，社会保障对农户家庭福利的贡献度排第一位，且远高于其他指标；经济状况排第二位；居住条件排第三位；此后依次为社会交往、生活环境和社会机会。从2019年6项功能项活动指标的权重值来看，社会交往指标权重值最高，经济状况指标排第二，就业与社会保障指标排第三，此后依次为居住条件、社会机会和生活环境。这表明在城镇化进程中，即使经济状况、就业与社会保障对于农户家庭福利水平持续改善的作用有所下降，但二者的相对贡献度仍然较高，因此，未来在着重提升农户家庭社会交往水平与社会机会的同时，仍然需要注重改善其经济状况、就业与社会保障水平。具体见表4和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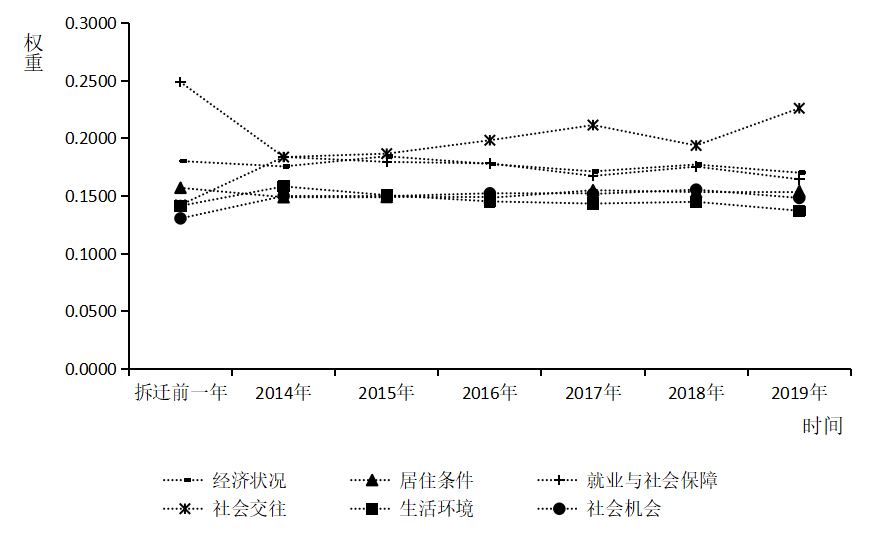


图2居民家庭各功能性指标权重值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21世纪以来，无锡市被调查农户较之被拆迁安置之前，集中居住之后家庭福利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且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交往、生活环境与社会机会六项功能性活动指标的隶属度均在2014年超过了0.5的中间值，达到了福利“好”的标准，但社会交往的隶属度在下降。从各项初级指标来看，2019年，家庭工资性收入、非工资性收入、家庭就业人数、人均转移性收入、人情往来支出、劳动力从业地点六项指标隶属度均未达到0.5的中间值，未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家庭福利各组成要素对家庭福利变动的贡献度看，集中居住后的数年间，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就业与社会保障对家庭福利的持续提升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基本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后，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生活环境等因素对持续提高家庭福利水平的效应在逐渐下降，而社会交往、社会机会对持续提高家庭福利的作用在逐渐增强。毫无疑问，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的集中居住城镇化是成功的，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扩充了紧缺的土地，也推动了农户家庭福利的持续提高。

无锡市“合村并居”为什么能提高居民福利？其一，“合村并居”后，腾出稀缺的土地资源，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集中居住的农户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户的收入，又因为有地方财政的支持，比如，被安置农户小区物业费等费用由地方政府负担，农户承担较低的生活成本，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得到持续的提升；其二，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地方的财政收入，从而有更多的财力提高农户的社会保障水平；第三，集中居住后，增加了住户的社会机会，更便于教育、医疗、健身娱乐；第四，集中居住的小区治安状况良好，提升了住户的安全感。

需要指出的是，江苏省无锡市成功推进“集中居住”的城镇化政策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其前提条件是：（1）发达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带动了该地区的产业升级。2002年以来，该地区的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为96.4%，同期河南、山东的占比仅为80%和86.41%。2019年无锡市的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达到了98.97%，同期河南、山东的该比值为91.37%和92.75%。二三产业的飞速发展为无锡市农户在当地非农就业提供了很多岗位，2002年无锡市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为79.77%，2019年该数值已经达到96.15%。随着就业人口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日益缩小，其城镇化水平日益提升。2002年，无锡市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中，第一产业收入占比仅为6.73%，2019年，无锡市农民可支配收入中第一产业收入占比仅为1.99%。2006年，无锡市的城镇化率便已经达到了67.1%，2019年上升至77.1%，远高于同期全国44.34%和62.71%的城镇化率水平，也远高于河南和山东省的城镇化率水平。[[7]](#footnote-7)（2）城乡一体化政策的有效推进。进入新世纪后，无锡市政府实施城乡一体化政策，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越来越小，城镇化已为普通农户所接受。（3）促进土地流转与土地集约化的客观需求。农村“空心化”问题非常严重，村庄土地处于浪费状态。（4）当地经济发展受到土地制约，迫切需要扩充工业建设用地。（5）在推行“合村并居”、“集中居住”政策过程中，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化解了众多矛盾，给农户的补偿及时到位。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合村并居”、“集中居住”政策就有可能损害农户利益，遭到强烈的反对。

反观中部一些地区，在进行“合村并居”之时缺乏支柱性产业，其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能够支撑大量农村居民集中居住。人民群众在集中居住之后，无法通过非农就业改善其生活条件，只是住在楼房当中从事着农业生产活动。一些地区在进行“合村并居”之前并未进行广泛的调研与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因此在推行过程中暴露出的各项矛盾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农户的利益受损，势必遭致反对。这种揠苗助长，只能适得其反。

无锡市“合村并居”城镇化的实践，对当前正在积极推进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如下的政策启示：第一，农户“集中居住”前，当地政府工作重点应是培育支柱产业，增强吸纳农户非农就业能力，增加农户非农收入，改善农户家庭经济状况。这是推行农户“集中居住”的前提条件。第二，农户“集中居住”后，政府要开展技能培训，落实社会保障，注重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防止农户福利短期内严重下滑。第三，农户“集中居住”后，政府工作重点应该是加强社区建设。应努力提升社会治安管理水平，建设优美的生活环境，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丰富文化娱乐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类社会交往平台，满足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这对持续提高农户家庭福利水平至关重要。

无锡市惠山区“集中居住”城镇化也不是孤例、特例。从全国范围看，浙江省等许多经济发达省份都推行了类似的城镇化，农户家庭的福利水平得到了持续性的提升。因此，无锡市“集中居住”城镇化模式在经济发达地区有一定的典型性与适用性。但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推选“集中居住”城镇化，则要慎之又慎，如果条件不具备，既伤害农户得益，也会弄巧成拙。

参考文献：

阿瑟·塞西尔·庇古，2017：《福利经济学（上卷）》，商务印书馆。

阿马蒂亚·森，2002：《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https://baike.so.com/doc/6718350-6932396.html" \t "https://baike.so.com/doc/_blank)。

崔红志，2020：《合村并居动因、效果及相关建议》，《中国发展观察》第7期。

段巍王明吴福象，2020：《中国式城镇化的福利效应评价( 2000—2017)——基于量化空间模型的结构估计》，《经济研究》第5期。

高进云周智乔荣锋，2010：《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下土地征收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测度》，《中国软科学》第12期。

高进云乔荣锋，2010：《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福利模糊评价的权重结构讨论》，《软科学》第6期。

黄永明何凌云，2013：《城市化、环境污染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中国软科学》第12期。

伽红凯王树进，2014：《集中居住前后农户的福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江苏省农户的调查》，《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

徐烽烽李放唐焱，2010：《苏南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前后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杨丽霞朱从谋[苑韶峰](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8%8b%91%e9%9f%b6%e5%b3%b0&scode=11268925&acode=11268925)[李胜男](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db=CJFD&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d%8e%e8%83%9c%e7%94%b7&scode=37896808&acode=37896808)，2018：《基于供给侧改革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福利变化分析——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中国土地科学》第1期。

易小燕方琳娜陈印军，2016：《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户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的福利变化研究——基于江苏省农户调查数据》，《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第6期。

张梦琳，2017：《农村宅基地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四市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赵学军隋福民，2017：《城镇化中的农户——无锡、保定农户收支调查（1998-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2013：《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对若干重大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与政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郑君君刘璨李诚志，2015：《环境污染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的实证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Bratt R. G.（2002），“Housing and Family Well-being”，Housing Studies 17（1）：13-26.

Cheli B. & Lemmi A.（1995），“A‘Totally’Fuzzy and Relative Approach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Economic Notes 24（1）：115-134.

Cerioli A. & Zani S.（1990），“A fuzzy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in：Dagum C.（eds），*Income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poverty*，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72-284.

Miceli D.（1998），“Measuring Poverty Using Fuzzy Sets”，National Centre for Social and Economisc Modeling，University of Canberra Discussion Paper，No.38.

1. \* 赵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zhao\_xj@cass.org.cn[；赵素芳](mailto:abc@abc.com；赵素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2488，电子邮箱：zhaosufangcass@163.com。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无锡、保定22村村庄经济的90年变迁研究（1929-2019）”（19AJL003）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footnote-ref-1)
2. 胡锦涛，2012年：《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第20页。 [↑](#footnote-ref-2)
3. 习近平，2020：《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7页。 [↑](#footnote-ref-3)
4. 《山东合村并居引巨大争议刘家义：先一律暂停》，人民日报客户端：[http://www.mnw.cn/news/china/229 3862.html](http://www.mnw.cn/news/china/2293862.html)。 [↑](#footnote-ref-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5页。 [↑](#footnote-ref-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514-515页。 [↑](#footnote-ref-6)
7. 数据来源于《无锡市统计年鉴2003》，《无锡市统计年鉴2020》，国家统计局网站。 [↑](#footnote-ref-7)